



钱其琛 作序推荐

19个经典案例剖析 40年外交经验总结

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前驻法大使 **吴建民** 的外交探索与实践

外交案例

吴建民◎著

CASE STUDIES IN DIPLOMACY





外交案例

吴建民◎著

CASE STUDIES IN DIPLOMAC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交案例/吴建民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ISBN 978-7-300-08758-0

I. 外…

II. 吴…

III. 外交史—史料—中国

IV. 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4533 号



外交案例

吴建民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51502011

编辑热线:010-51502036

网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朗朗书房网)

<http://www.crup.com.cn>(人大出版社网)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张 22.75 插页 2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72 000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钱其琛序

2003年夏天,吴建民同志就任外交学院院长后曾向我讲述了他打算在外交学院开办外交案例课,我当即表示支持。外交部每年从大学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中招收几百名工作人员,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会成为我们未来的外交官。然而,他们从来没有学过外交案例,他们在课堂里学习了大量的有关国际关系、国际法和外交方面的书本知识。他们进入外交部后,初期有些茫然,对外交往有“不得其门而入”的感觉。学习外交案例后,可能就会拉近他们与外交实践的距离,有利于他们未来的成长。这是我支持开办外交案例课的原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中国的外交是走了一条新路。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外交有了很多的创新。外交实践往前走了,外交理论往往滞后。理论源于实践,研究外交案例,便于我们总结提高,上升为理论。这样,会有利于逐渐改变中国外交理论远远落后于外交实践的局面。

世界发生了重大而又深刻的变化,我们的时代已经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里,外交的作用上升,事实上中国的外交已经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吴建民同志这本《外交案例》用作教材我认为是一件好事。

钱其琛

2007年夏于北京

自序

我把我讲授过的十九个外交案例集中起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却了我一桩多年的心愿。

要总结外交案例，这不是我到了外交学院后才有的想法，这个想法由来已久。

我1959年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分配在外交部。外交部让我再读三年研究生，结果，我学了一年半，1961年1月被借调到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工作，开始了我的外交生涯。1961年1月至1965年8月，我大部分时间是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里度过的，我的工作是为中国代表们做翻译。1965年9月，我回到了外交部。2003年7月，我结束在法国的任职，离开了外交一线的岗位。我总共干了四十二年半的外交，搞过民间外交，也搞过官方外交；搞过多边外交，也搞过双边外交。多年外交，我见了很多，听了很多，想了很多。

长期的外交生涯使我深切感到，一方面中国的外交在大发展，需要一大批高素质的外交官；另一方面，我们培养外交官的方式还是相当陈旧的，基本上是“手工作坊式”。年轻的外交官跟上一些领导，从这些领导的言传身教中学习，有点儿像“师傅带徒弟”。年轻外交官悟性好的，又碰上了优秀的领导，成长就会比较快，否则就不那么快。因为在大学里没有学过外交案例；到了外交部门工作，虽然有很多的总结报告，但没有人给你讲授外交案例。一件事情办成功了，首先是归功于中央的正确方针。这完全对，因为如果方针不对，外交官有再大的本事，也很

难发挥出来。同时必须看到,在方针正确的情况下,外交工作仍然存在很大的开拓创新的余地。而这一部分,在我的外交生涯中没有人去讲,也很少有人去总结。我们的思想上有一个误区,即不应该宣传个人。其实,事情都是人做的。一件事情,张三去做,成了,李四去做,砸了,这里面就有学问。如果不去总结,不去发掘外交官的聪明才智是如何产生的,是怎样发挥出来的,年轻外交官的成长就会比较慢。这也就是钱副总理所说的“不得其门而入”。

2003年7月,我就任外交学院院长后,向外交学院党委报告了想开办外交案例课的想法,得到党委的大力支持。我特别感谢钱其琛同志为本书作序,和对我开办外交案例课的支持与肯定。应当说,钱其琛同志所撰写的《外交十记》是中国的第一本外交案例教科书,《外交十记》的出版对外交学院外交案例的教学有极大的帮助。他把《外交十记》的全部稿费捐给外交学院,设立了“外交十记奖学金”,每年奖给50名品学兼优、家庭贫困的学生。对于这些学生来说,“外交十记奖学金”不仅是物质,更重要的是精神,推动他们刻苦学习,报效祖国。我相信他们当中会出一些人才。《外交十记》的出版、“外交十记奖学金”的设立和钱其琛同志对外交案例教学的支持,充分反映了他对中国外交未来的关心和殷切希望。

外交部的领导李肇星同志和戴秉国同志也十分支持我开办外交案例教学。教外交案例毕竟是一个新事物,在做的过程中困难是很多的,但由于有外交部领导的支持,这项工作开展起来相对也还比较顺利。

本书集中的十九个案例可分为六章。第一章是外交大智慧。我按时间顺序挑选了三个案例:顾维钧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拒签对德和约,1955年周恩来总理出席万隆会议和韩叙大使1989年在美国棕榈滩论坛俱乐部的演讲。反映外交家的大智大勇的案例很多,我挑选了三个算是开个头。

第二章是逆境外交。我选了1989年到1992年中国处于逆境时,

外交上的几件大事。

第三章是首脑外交。我选了1993年至2006年我所经历的三个各有特色、影响重大的案例。

第四章是多边外交。我选了我所经历的日内瓦人权斗争和中国申办2010年上海世博会两个案例。

第五章是使馆工作。我选了四个驻法使馆的案例。

第六章是危机处理。我选了三个案例。撞机事件和“9·11事件”都很有典型意义,我有幸当面请教了江主席和处理撞机事件的外交部高级官员。

十九个案例内容都十分丰富,几乎每个案例都可以写一本书。但是为了教学的需要,又不能太长。所以,《外交案例》的体例大体上分为四个部分:背景、中国外交面临的选择、具体操作过程、启示。前三部分尽可能把外交案例事件当时的主要情况介绍清楚。“启示”大体上是我的一些体会和看法。

我特别感谢史凤池同志对本书的关心和支持。

我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呼延华副总编辑及郝明慧、张杰编辑对本书出版所给予的鼓励和帮助。

我还要感谢为《外交案例》付出大量心血的袁国厚大使和高飞老师,以及外交学院院长办公室的韩敏主任、李洪梅副主任,还有阚四进和闫宇。院办的四位同志不顾今年北京的酷暑,同我一道为撰写本书而努力。没有上述同志的帮助,《外交案例》是不可能问世的。

把外交案例集中起来正式出版作为教材这可能是第一次,由于本人的水平和知识有限,一定有很多的不当之处,切望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吴建民

2007年7月于北京

目 录

第一部分 外交大智慧	1
顾维钧在 1919 年巴黎和会上拒签对德和约	3
1955 年周恩来总理出席万隆会议	27
韩叙大使 1989 年在美国棕榈滩论坛俱乐部的演讲	57
 第二部分 逆境外交	 85
1989 年斯考克罗夫特两次访华	87
中国与第一次海湾危机	106
1991 年美国国务卿贝克访华	144
1992 年李鹏总理出席安理会首脑会议、 达沃斯论坛年会并访问西欧	154
 第三部分 首脑外交	 179
1993 年江泽民主席出席 APEC 首次峰会	181
江泽民主席与希拉克总统互访故乡	195
胡锦涛主席出席埃维昂南北领导人对话峰会	206

第四部分 多边外交	219
1996—1997 年的日内瓦人权斗争	221
驻法使馆是如何参与我国	
申办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	245
 第五部分 使馆工作	 281
上海贝尔与阿尔卡特股权重组	283
巴黎中国文化中心的建立	294
中国参加“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	304
中国参加“伽利略计划”	313
 第六部分 危机处理	 321
2001 年中美撞机事件	323
中国对“9·11 事件”的快速反应	335
驻法使馆是如何应对“非典”危机的	349

第一部分 外交大智慧

外交官是一个极为需要智慧的职业，特别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巨大的挑战的时候，外交官的智慧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此选择了以下三个案例来说明外交大智慧的重要性。

顾维钧在 1919 年 巴黎和会上拒签对德和约

顾维钧 1888 年生于上海,1904 年 8 月赴美留学。1912 年,正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顾维钧,接受了刚刚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的邀请,返回中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1915 年,顾维钧出任中国驻美国公使。1918 年 11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顾维钧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出席巴黎和会。

顾维钧是民国时期中国最著名的外交家。有人曾问过晚年的顾维钧,搞了一辈子外交,最得意之举是什么?他回答说:是巴黎和会。其女儿顾菊珍说:“中国现代史表明,先父顾维钧是在国际会议上对列强说‘不’的第一人。”以顾维钧为代表的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对德和约,使日本通过和约窃取德国在山东权益的企图受挫,在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本案例着重研究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代表中国拒签对德和约的情况。

一、背景

(一) 中国与“一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中国人觉得在欧洲打仗离中国很远,与我关系不大。中国政府遂宣布中立,并照会各国,声明在战争中不参加任何一方。交战国均表示承认中国为独立国。不久,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在中国参战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协约国为拉中国参战,曾许诺“保证中国会取得大国的地位”。1917年8月14日,中国政府对德奥宣战。中国宣布参战后并没有派兵到欧洲作战,但曾派遣华工前往法国和中东的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为协约国集团战地效力,并且为协约国家提供了大批粮食等援助。

“中国参战后,协约国相继向中国保证,支持中国享有国际大国地位,并于9月8日对中国所提出的参战条件作了答复,同意:一、庚子赔款暂缓5年偿还(俄国只允暂缓一部分),不另加利息,并撤销对德奥的赔款;二、增加5%关税的原则,具体办法另行议定;三、天津周围20里内中国军队可以暂时驻扎,以防范德奥两国侨民的行动。”^①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持续四年零三个月之后,以德奥集团的彻底失败告终。

(二) 中国出席巴黎和会希望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

1897年,德国借“教案”事件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由于

^①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三卷,424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清政府的软弱无能,次年3月6日,被迫与德国签订《胶州湾租借条约》。除了赔偿数百万两白银外,条约还规定将青岛及胶州湾租借给德国99年,山东正式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成为战败国,其在中国的权益理应归还中国。而且,中国在一战中对德宣战,是名副其实的战胜国,因此,自然要求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作为安排战后新秩序的巴黎和会成为中国收回山东的最佳场所。中国朝野许多人士都期望通过巴黎和会废除几十年来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以战胜国的姿态在和会上一下子改变近八十年来受屈辱的历史。1919年1月,中国派出以外交总长陆徵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

(三)日本力图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1914年8月,日本政府以“承担日英同盟的义务”为借口,打着“保卫东亚和平”的幌子,宣布对德作战,并对德国的租借地发动了进攻。日军出其不意在其租借地不远的后方龙口登陆,向青岛推进。这一举动,事先并没有通知中国政府,显然是对中立国领土的侵犯。德国由于在欧洲战场无法分身,在青岛的抵抗只不过是象征性的,仅两天的工夫,战争就结束了。德军投降之后,日军进入并接管了包括青岛在内的整个德国租借地,紧跟着控制了青岛至济南府的铁路。

随后,1915年1月刚从东京返回的日本公使要求特别会见袁世凯总统,公然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要求的内容共分“五号”,即五部分,其中“第一号”规定:要求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给他国;准许日本修建自烟台(或龙口)连接胶济路的铁路。



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

显然,日本的目的是向山东省进行扩张,同时,还意味着要把战略要冲山东省作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为瓜分中国作准备。

“二十一条”是要中国的政治、军事、财政及领土完全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把整个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完全违背了国际关系的根本准则。但是,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向日本表示,除第五项“容日后协商”外,其余全部接受,这为后来山东问题的解决埋下了隐患。

(四)中国开始时对实现自己的合理要求寄予希望

1918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在欧战即将结束之时,发表了著名的《十四点宣言》。其中规定的国际盟约不得秘密行事,国无大小一律平等原则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可。许

多国家,尤其是日本,曾签订了众多有损中国主权的秘密条约,如“二十一条”。每当中国在外交上独立行动时,这些国家即以密约为依据处处限制中国的行动。因此,威尔逊的主张对中国外交显然是有利的。

在一战初期,中国并没有参战。随着战争的深入,巨大的伤亡使得交战各方兵源锐减,劳力奇缺,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使英法等国的人力资源紧张局面进一步加剧。为摆脱困境,英法等国把目光转向中国,招募华工来解决战争需求。在两年的战争中,中国共派出 17 万劳工到达法国,主要工作是战地后勤。到战争结束,大约 2 万名劳工战死、累死在欧洲。

一战以后的国际环境、中国在战争中的特殊贡献,以及西方各国政府的承诺使中国政府有理由相信,在一战以后重新分配各国利益的巴黎和会上,中方的合理要求会得到西方各国的支持。

(五)顾维钧在和会前进行了悉心准备

顾维钧虽然年轻,但学识渊博,深谋远虑。1917 年,中国对德国宣战。敏锐的顾维钧感觉到协约国不久将取得胜利,中国可以借战胜国的机会收回德国在华特权,恢复大国地位。为此,他作了悉心的准备。他在大战结束前就在驻美使馆内成立小组,专门研究与战后和会相关的问题,并将研究报告送交国内,主张应向和会提出收回德国强占山东的权益。他还向外交部建议,聘请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时的指导教授约翰·穆尔为使馆顾问,借重他的外交实践经验和国际法知识为参与和会作准备。

在被任命为外交团代表,前往巴黎参加和会的前夕,顾维

钩整天埋头于准备工作,为中国代表团草拟了一项计划,包括“二十一条”、山东问题、收回租借地等七个问题。此外,他还对国联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为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此外,顾维钧还专门拜会了以威尔逊总统为首的美国代表团,向他们阐述了中国对和会的要求,获得了美国政府在和会上尽力支持中国的承诺。

(六)和会上激情演讲、据理力争

刚到达巴黎,中国代表团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相关提案,但是日本却抢先向和会提出无条件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要求。由于事关中国,根据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提议,和会请中国代表团就此进行说明。中国代表团共由五人组成,分别是外交总长陆徵祥、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和驻比利时公使魏宸。这对中国代表团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但由谁来承担这一任务却成了问题。陆徵祥称病无法赴会,王正廷、施肇基均以对山东问题不熟悉为由推顾维钧代表中国发言。顾维钧没有退让,毅然决定挑起了这一重担。

1月28日,经过细致的准备,顾维钧在由英、美、法、日、意五国组成的和会最高机构“十人会”上代表中国发言。这是顾维钧第一次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作长篇演讲,而面对的是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雷孟梭这些世界著名的政治家。在经历了最初的紧张后,顾维钧随即就充满激情地全身心地投入到演讲中去了。

以下是顾维钧在巴黎和会“十人会”上发言记录稿的译文(英文原稿见附录)。